

后起之秀杨瑞生

民国初年杨斯盛虽然已谢世，但是浦东帮建筑施工队伍已发展为数万人。“川沙、上海间，朝发夕至，自上川铁路通车，一小时即达，于是上海成为容纳川沙万余人口之绝大尾闾。论其量，则数之大，以水、木工人为第一，他业亦颇有相当地位。论其质，则无论以知识、以劳力，凡能自食，或因以起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恃上海。”

更多的高桥人在杨斯盛和王松云、钟惠山、周瑞庭等人影响下，纷纷加入营造业队伍，拜师学技艺，杨瑞生便是其中之一。

杨瑞生 1874 年出生，高桥杨家栅人。幼年在家读过私塾，14 岁时就去上海拜师傅学木匠手艺，他不仅勤学技术，工余时间还自学英文。20 岁时他做翻样，能用英语与外国人交谈，并结识了一批工商界人士，1903 年他开办杨瑞记营造厂，上海厂设在斜徐支路永庆里，杭州设分厂。

他先后承建四川北路永乐坊、天平路树德坊、淮海中路乐安坊、瑞金二路锡德坊和陕西北路西摩别墅、太原路台拉别墅、安福路来斯别墅等各类住宅 400 幢。还承建西方装饰主义风格、技艺要求很高的新光大戏院和中国饭店。淮海路上的巴黎大戏院(淮海电影院)和延安东路四川中路口与会德丰大楼是他承建的西方现代派风格的建筑，以建筑流线型线条和大玻璃门窗显示最新潮流现代感。

谢秉衡 1885 年生，高桥谢家弄人。幼年家贫，13 岁到上海在舅父处学木工，他学技十分刻苦，数年后能独当一面承揽木工生意。学成后，曾在浦东帮的姚新记营造厂当过看工(技术负责人，也称监工)，参加外白渡桥、二白渡桥和德律风电话公司大楼建设，掌握了西方的钢结构

高桥匠人与外滩老建筑(下)

◆ 姜承浩 薛顺生



友利银行大楼



亚细亚大楼

和钢筋混凝土新技术。他自学的英文能阅读英文版技术书籍，与外国人能流利会话，他与英租界工部局的主管建筑的哈伯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1910 年，谢秉衡与张裕田、乐俊堂合伙创办裕昌泰营造厂。张裕田是浦东南汇人，其父亲是杨斯盛一代有名的泥水匠，张裕田承袭父业将水木作改为营造厂，曾在南京承建南京劝业会场和钢筋混凝土拱桥，因当地绑匪扬言要绑架他，他只得逃往上海。谢秉衡与张裕田等联手之后，凭借着张裕田以前积累的经济实力。自己的技术和人脉关系，1913 年在承接英租界工部局大楼投标中，击败众多竞争对手一举中标，使人刮目相看。

同年，裕昌泰又承建了麦边洋行(后为亚细亚大楼)，英商马海洋

行设计，楼高 7 层，建筑面积达 11717 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施工时由于混凝土浇灌时必须保持连续性，才能确保现浇构件的强度，谢秉衡在上海首次采用筒形混凝土搅拌机。

不久，他又承建友利银行大楼，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楼高 6 层，建筑面积达 13624 平方米，这是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结构的高楼，工字钢材由德国克虏伯钢铁厂供货。面对着这个全新的建筑技术，他凭借着参加过外白渡桥施工的经验，又顺利完成了钢框架大楼的施工。

1921 年英商著名的怡和洋行要在外滩盖新楼，由英商思九生洋行设计，楼高 6 层，建筑面积达 15976 平方米。根据设计图纸一、二层外立面要砌贴粗凿的长方形天然毛石，每块毛石体积大重量大，他解

决了砌贴的技术问题，又成了上海营造业中一个创举。一个华商营造厂一连在上海银行商界龙虎相争的外滩建造起三幢标志性的高楼，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向世人宣示中国人能建造一流的高楼大厦。

谢秉衡在上海承接的工程项目很多，有杨树浦煤气厂、上海第三第四第五纱厂、蜜蜂绒线厂、怡和啤酒厂、正广和汽水厂、沙利文面包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还有南京邮政局、青岛纱厂。

他不仅是个出色的营造家，更可贵的是他十分注重技术传承。他在担任上海市营造工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时，兼任公会办的通惠子弟学校校长，培养基层施工技术工人，凡是他的营造厂工人读夜校的费用均可报销。

他是发起成立上海市建筑协会

第四极

许晨



11.“下不去”与“联不上”

整整一天，我一会儿待在指挥部里观看，一会儿跑去“炮楼”里感受，就如同自己下到深海一样，祈祷着“蛟龙”号好好表现，可别出一丁点问题。刘峰总指挥看出我想了解又不愿打扰大家的心态，便主动邀我来到“蛟龙”号“水面显控系统”大屏幕前，指着不断变化的数据和图表，向我细致而全面地介绍“蛟龙”号的下潜情况。总之一句话，目前一切正常，“蛟龙”号按计划潜到了 2500 多米的海底在工作，而后沿着“采薇”海山斜坡向上升。搭载的“龙珠”无人潜水器也进行了三次试验，放出去又平安收回了，还拍了视频照片。

时间很快到了 15 时许，分管潜航联络的唐嘉陵与水下通话：“‘蛟龙蛟龙’，我是‘向九’，请注意时间，按时抛载上浮。”按计划，“蛟龙”号应在 15 时 45 分结束工作上浮。

17 时 30 分左右，在海底奋战一天的“蛟龙”号安全上浮了！如同早晨出征时的回放一样——它那红色的头背部悄然露出海面，早已等候的“蛙人”小艇驶过去，水压涌浪，依次挂上龙头缆、主吊缆，由 A 形架平安地回收甲板，安放轨道车移动就位。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先用淡水冲洗一下潜器，再细心地帮助打开舱盖，放下小笼子。这时甲板角落的四大桶海水特别引人注意。原来按照国际深潜界的传统，第一次从海底回来的人要接受海水的洗礼。叶聪和傅文韬都是获得深潜英雄称号的老“深潜”了，早就品尝过海水的滋味，唯一的目标就是初次下海的何震。叶聪和傅文韬特意让何震第一个出舱。当他笑着挥手向大家，兴奋地走下扶梯时，迎面而来的是一桶桶欢乐的海水……

本航次首次下潜圆满成功，中国大洋协会和国家深海基地都相继发来贺电。不过，回顾我国深潜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成功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挫折中发展起来的。哪怕只是简单的“入水”，当年海试第一潜时，也曾陷入“下不去”与“联不上”的困境。

2009 年 8 月 15 日清晨，“向阳红 09”船载着海试团队和精心打造的“和谐”号深潜器，在三亚锚地南 25 海里处实施海试第一潜。水面支持系统、担负解挂缆的“蛙人”小分队和各个保障岗位的海试队员们，按照各自的分工和平时的演练，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地工作着。8 时 30 分，潜航员唐嘉陵、声学所的技术人员张东升先后进舱。

8 时 55 分，主驾驶唐嘉陵熟练地检查完各种设备，一切正常，向指挥部做了报告。随着一声“布放”的口令。机声隆隆，轨道车后移，A 架前摆、主吊缆下放并与深潜器对接、起吊、副钩接上、A 架向后摆动。眼看 A 架摆到位，潜水器吊离船体，却突然发现副钩无法脱开，反复操作仍不能脱钩。负责操作的 701 所工程师余建勋脸上冒汗，面庞更显灰白。潜水器舱内，三名试航人员被吊在空中，迟迟下不了海，满腹狐疑。现场指挥部很快下令“收回潜水器”。A 架把深潜器放到轨道车上带回甲板。技术人员迅速检查：发现是在起吊时主缆收得不到位，两只副钩只挂上一只，由于这只副钩受力过大，导致不能解脱。

故障排除，潜水器再次起吊并顺利入水，试航员开始进行水面检查。张东升启动声学系统调试，结果与母船联系不上。通信频道里一片嘈杂，急得主驾驶小唐和声学技术员小张抓耳挠腮，一筹莫展。按照海试规范，水面与水下通信建立不起来，潜水器是不能下潜的。总指挥刘峰不得不再次下令：回收潜水器。当晚，船上的潜水器声学组人员在通讯系统总设计师朱维庆教授的远程指导下，在中科院声学所的全力支持下，连夜故障排查、紧急抢修，终于有了好的结果。

17 日，“向阳红 09”船奔赴 A1 海区 50 米等深线，深潜器将在这里进行 50 米深第一次下潜。布放入水很顺利，蛙人也已解开龙头缆和拖曳缆，水面检查正常。总指挥刘峰发出“下潜”指令后，意外发生了：压载水箱注水系统启动，直至注满，潜水器仍然浮在水面上，就是不下潜！指挥部里一片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刘峰手拿着话筒，一遍遍呼叫着：“和谐、和谐，检查水箱！”“注水正常，已经全部注满。”“使用自身推力器。”“是。”试航员一边应着，一边操作下潜装置，仍然不行！潜水器固执地漂在水面上，就是不下潜。

15.小圣玛丽街

那段时间里，史蒂芬的导师丹尼斯·夏默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们解决了住宿难题。他联系了彼得学院的一名研究员，这位研究员正想将学院租来的小圣玛丽街 11 号转租出去。这里的地址非常理想，离史蒂芬位于剑桥大学出版社大楼的实验室不到 90 米。房子里虽然没有家具，但我们可以随时入住。我们从积蓄和婚礼礼金中拿出一部分购置了一些必需的家具，一张床和一个电磁炉是必不可少的。

趁着等待床被送来的空闲时间，我出门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回来后，发现热心肠的邻居特玛·撒切尔给史蒂芬提供了一把蓝色小椅子。她是非茨威廉学院前院长的妻子，在此后的十年里，她成了对我们提供帮助最多且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人。那天晚上，我们用新买的电磁炉和在康奈尔买的锅做了晚餐。配上盛在水晶杯里的葡萄酒，用一个 大纸箱当临时餐桌。我与史蒂芬度过了在小圣玛丽街的第一个夜晚。

小圣玛丽街的街口外有两座教堂，右边是维多利亚联合改革教堂，左边是小圣玛丽中世纪教堂。路的最南边有一片铁栅栏围起来的空地，那是这条街上的老墓地。整个墓地就像一个花繁叶茂的植物园。小圣玛丽街的右侧全是三层楼高的别墅，我们住的 11 号就在这排别墅的尽头。这些房子年代久远，最早的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特玛·撒切尔自封是这条街的管理人，她在教堂花园里种植了好几株玫瑰，还时常会把爱犬马蒂牵到这里玩乐。她也会监督街区其他邻居对花园做出的一举一动。

我们搬到这里仅一个星期，又从她家借了好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口铁锅和几个盘子。她还帮我们从查尔莫斯修女那儿借来一个煤气炉，那位修女在彼得学院当护士，她就要搬进学院的房子了，那里什么都不缺。

撒切尔经常邀请我们去她装修别致又温馨的家里喝雪利酒，还答应帮我们找找现在的房子到期之后的住处。那是 1965 年，撒切尔那时应有 70 岁了，但她又黑又长的头发加上精神饱满的外表看上去至少比实际年龄年

轻十岁。她喜欢给旁人讲述她过去的故事，且总是讲得生动有趣、全情投入。尽管史蒂芬她在一些理念方面有分歧，但基于她慷慨善良的人格，史蒂芬对她总是尊重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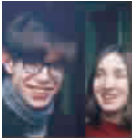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玛·撒切尔对我 和史蒂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当我有事去伦敦时，她还会帮我照顾史蒂芬。其实，她自己的生活也不清闲，一边要照顾步入老年的丈夫的饮食起居；一边要帮助女儿玛丽。玛丽当时正筹划一部关于住在印度的英国人的纪录片。

转眼间，我需要回到韦斯特菲尔德学院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每周一早上我都要与史蒂芬艰难地道别，我俩都要与艰辛的生活作斗争。史蒂芬的身体状况在家里还能勉强支撑，如果晚上没人邀请他去某地聚餐的话，他就要独自在国王街走过一段对他而言艰难又漫长的路程才能抵达学校食堂进餐。街对面的邻居兼好友安妮·扬答应我，每天晚上都会向窗外多留意史蒂芬的状况以确保他安全通过。此外，附近的热心邻居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当史蒂芬在食堂用餐完毕回家的时候，街上的邻居总会关切史蒂芬的情况。等史蒂芬回到家中，他们会打电话给我。

我的生活变得极为疲惫。每周一早上我都要赶往伦敦，接下来的五天我都会待在韦斯特菲尔德学习，直到周五下午再加入乘客大军。每到周五下午，我总是焦急耐望地希望回到剑桥，回到霍金身边。回家的路上，我会不断地看手表、咬手指，担心错过从利物浦中转站赶往剑桥的火车。在此后的几年，我常常梦见地铁停止在隧道里，真是糟糕的噩梦。

来回于伦敦与剑桥之间并非最痛苦的事情。从周一到周五，我在学校的压力也很大：西班牙语与英语的互译、论文和课时作业都必须按时上交，而我唯一能做功课的时间只有夜晚。周末我也不能休息，我要上街买好下周家里需要的日用品并打扫房间，或者帮史蒂芬打印他的论文。史蒂芬平时会随手涂鸦般地写一点手稿，在我周末回家后交给我。我会挤出时间用打字机将它们打印出来。我大学之前上的那些秘书课在这时起了大作用。

我和霍金的生活



简·霍金著

张敬王翰民译